

# 一衣帶水睦鄰邦 詩書傳家繼世長

## ——中外家訓交流與互鑒（二）

□ 柯 昊

中日兩國隔水相望，一衣帶水，有非常深厚的文化淵源。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以家訓治家在文明交流中被東鄰日本積極借鑒和模仿，形成其独具特色的家訓文明。日本家訓發展史與儒學傳入史相一致，最早產生於奈良時代，在封建時代的江戶時期發展至頂峰，名篇輩出，影響深遠。日本以家業為中心建構的“家”與中國以血緣締結的“家”有着根本不同，因此日本家訓主要目的是維護家業延續。由於日本人普遍認為有無法直接關係到家族的盛衰，家訓在日本并非仕宦儒者专有，貴族、武士、商人、普通百姓之家皆有之。正因如此，日本的家訓雖然受到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傳統家訓的影響，却又具有尚武、功利、實用等鮮明特點。

### 《私教類聚》

日本的第一部家訓產生於奈良時代，是由吉備真備所撰的《私教類聚》。奈良時代（710—794）是中日歷史上友好文化交流的盛世。吉備真備於716年和749年作為遣唐留學生和遣唐副史曾兩度入唐，在唐朝生活20多年，博學眾藝，授以左補闕、儀王友等職。回國後他在日本廣泛傳播中國文化，在孝謙天皇時期官至右大臣，推動仿效唐制的各種改革。吉備真備用所學中國文化教育訓誡子孫，參考号称中國“家訓之祖”的《顏氏家訓》，撰寫《私教類聚》。在這樣的教養下，他的長子泉、女兒由利和末子枚雄分別仕於奈良政權。《私教類聚》共有三十八項，多處引用《論語》《禮記》《史記》，兼融儒佛，文武並重，指出子孫必須遵奉的道德價值和行為規範。提出要全面學習中國文化，務實重用，兼重武道。之後，皇族與貴族中興起對後代的訓誡，產生日本歷史上第一部帝王家訓，即宇多天皇總結政治經驗而寫成的《寬平御遺誡》。

整體來說，奈良和平安時代的家訓文獻並不多，集中出現在大化革新後。這一時期，日本仿效唐朝政治制度和儒家文化，建立了文職政府，在長達四個世紀的

時間里以儒家倫理為核心的家訓才得以發展。平安時代後期，日本社會矛盾促使以武藝和戰爭為業的武士階層崛起，並於1192年建立了武家政權——鎌倉幕府。從此，日本列島進入以莊園經濟為基礎、以武士為統治階級的武家社會，尚武精神成為武家社會的主導精神，武家家訓文化充分發展，商家家訓文化開始萌芽，其他各階層家訓文化隨之產生。

### 《明君家訓》

德川家康開創的江戶時代（1603—1868），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創立的朱子學被幕府定為官學，儒學在日本迎來了極盛時期。江戶時代武家家訓深受朱熹學說影響，而且尤為強調君臣關係、身份差別，體現出儒學教化的特點。這方面的典型家訓是《東照宮御遺訓》和《明君家訓》，這些家訓向武士闡述了儒家倫理思想。

《明君家訓》由江戶中期著名朱子學者室鳩巢撰寫，主要講述藩主君要求家臣的行為規範，共20條。室鳩巢曾任幕府儒官，擔任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的侍講。家臣即“武士”，《明君家訓》首條開宗明義指出“士”的職責是直言進諫，在第四條和第二十條分別指出士所應遵循的道德規範和價值觀念，即“謹守士道”和“士守義理”。其餘十七條從踐行角度將儒家的修齊治平貫穿到武士的日常踐履中。《明君家訓》以儒學思想為依據建立武士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範，影響深遠，當時重要的大名家訓、細川宣紀家訓、酒井忠進家訓、松平定信家訓都是在《明君家訓》基礎上改造出來的。1715年，京都書肆柳軒軒出版《明君家訓》以後，广为流传，有登城士人怀揣一冊的說法。

### 儒學對日本家訓的影響

儒學對日本家訓的影響深刻，首先體現於義理觀的構建上。日本家訓自誕生起就包含若干儒學因素，在江戶時代深受儒家綱常思想影響，北宋儒學集大成者朱熹

創造出來的“天理”轉化成為其核心價值——義理。室鳩巢在《明君家訓》中指出，“只將義理一事定作士之職也”，在士農工商四個等級中，士專司義理。義理指的是宋明理學“存理去欲”“舍利取義”的儒家倫理道德觀。

其次是五常觀的運用。天理是宇宙萬物的本原和根本準則，五常和五倫是天理在人類社會中的具體表現和治國的根本，也即日本家訓中士以及其所代表的家臣階層尊奉的“義理”。戰國武將多胡辰敬提到“仁義禮智信五常”，五常所包含的仁義禮智、孝悌忠信道德價值觀被認為是“武士之心”，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等五倫則是“武士之操行”。儒學修身齊家思想在家訓中廣泛運用，武士在武道職責之外被要求有嚴謹的自律和道德上的追求。《內藤伊泰家訓》直接引用《論語》關於孝道的論述：“父母不可不孝。言語云，事父母能竭其力。”兄弟之間應該“應敬兄愛弟”“兄弟不可稍有輕慢。后漢書云，兄弟，左右之手也。”

最後是和眾觀的建立。中國家訓文化吸取了儒家思想中的“和”思想，在帝王家訓、仕宦家訓、平民家訓中均用“和”來教導家族成員，形成父慈子孝、長幼有序的和諧局面，以期永保家族昌盛。這種“和”的觀念對日本家訓影響甚大，聖德太子在7世紀頒布的日本第一部成文法《十七條憲法》中第一條就規定“以和為貴，無忤為宗无”。許多家訓明確規定：“要有一顆正直和平之心”。近世商人三井家說“單木易折而林木難折，汝等應相協和睦，共圖家運之巩固”。儒家“和”思想強化了日本家群體的認同感和凝聚力，促進了上層恩惠和下層奉獻的擬血緣家族式共同體的穩定，確保整個社會結構的內部秩序。日本号称大和民族，正是汲取儒家“和”思想的直接体现。

### 日本家訓的民族特點

美國文化人類學者魯思·本尼迪克特寫出了深入洞察日本文化和國民性格的

《菊與刀》，提出“文化形貌論”，認為不同民族文化具有不同的類型和特徵。以家訓而言，同樣產生於東亞儒家文化圈，日本家訓文化卻表現出鮮明的民族特質，建立了獨樹一幟以忠義、實利、重兵為精髓的家訓文化系統。這樣的家訓文化導向了與中國儒家文化和而不同、天下大同完全不同的以民族生存為首要意義的武士道精神和軍國主義傳統。

首先以忠義為根本。日本家訓雖然援引了儒家文化的“五倫”和“五常”，却尤其突出其中的君臣關係，以忠義價值為主體涵攝其他思想，以君臣大義為首要義務。儒家文化是以仁為核心建立的價值體系，“人者，仁也”，從早期儒學的“泛愛眾”到心學的“萬物一體”，理學的“民胞物與”，仁所包含的是天地萬物生命和諧共存的理想境界。但日本家訓卻以“忠”代替了“仁”的價值主體地位，以對本國和本民族的“忠”為根本，使義、禮、智、信其他五常觀念圍繞“忠”展開。在以忠義為本的價值建構中，逐漸缺失了儒學中的人本關懷和終極思考，民族共同體被置於人類命運共同體之上。

其次以實利為導向。日本家訓在主旨追求上和傳統儒家文化截然不同，求取現世的職業和謀生，以及未來家業的延續性是其家訓文化的實利性體現。儒家文化卻追求修身成聖，修齊治平，建立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道德取向和功利取向的歧異凸顯出日本家訓的鮮明民族文化特點。

最後以尚武為手段。日本家訓中反覆強調“弓馬”之道的重要性，一直突出尚武的精神品質，認為武道比文道更為重要。日本家訓的武道傳統可以追溯到吉備吉真，他在唐朝學習時，深入研習了《孫子兵法》，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勇”和“尚武”帶回本國，《私教類聚》中解釋了武道對於治家理國的重要作用。



環球

# 百死千難中得来的“致良知”

## ——王阳明的一生（下）

□ 车 凤

王阳明创建“心学”，反映了现实人心私欲之甚，但他深信是“无明”产生了恶行，掩蔽了人们的良知。他倡知识分子追求成圣，以恢复与宇宙自然、天下家国和民众一体的博大的圣人之心。可以说，阳明心学是对当时国民性弊端的深刻思考和批判，也是最早开出的拯救病态人心的“药方”。

### 屡遭陷害而心存光明

1517年正月，46岁的王阳明到达江西开始剿匪，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通过非凡的谋略，1年零3个月，后，“攻心为上”的他成功剿除各路匪患，发布南赣乡约，厘清行政。通过事功的建立，他的“事上练”更臻完善，并写出《大学问》一书。

47岁时，王阳明征三泖，立社学教化沿途当地百姓。历经1年零3个月，危害多年的四省流民暴乱被阳明平定。如果说知行合一的“知”，乃良知显现的“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王阳明能够将剿匪告示写得非同凡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告谕涇洲巢贼》有云：“夫人情之所共耻者，莫过于身被为盗贼之名；人之心之所共愤者，莫甚于身遭劫掠之苦……尔等今虽从恶，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为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须除去二人，然后八人得以安生；均之不得，父母之心何必欲偏杀二子，方为已也；吾于尔等，亦正如此……吾南调两广之狼达，西调湖、湘之土兵，亲率大军围尔巢穴，一年不甚至于两年，吾年无穷至于三年。尔之财力有限，吾之兵粮无穷，纵尔等皆为有翼之虎，谅亦不能逃于天地之外。”王阳明剿匪与他人的不同，在于他从“心学”的根本出发，从天、地、人“三才”一体观和民本主义出发，体现了对天下生民之生存的关怀。

1519年农历六月十五，宁王朱宸濠造反，被48岁的王阳明所破，仅用43天。然而，此举令王阳明不仅无功反而有过，被张忠团伙污蔑刁难，在皇帝和太监们的逼迫下，王阳明忍辱向皇上报呈《重上江西捷音疏》，将之前呈报的《擒获宸濠捷音疏》重写一遍，并将擒获朱宸濠、平定叛乱的功劳记在皇帝和太监们的名下。至此，朱厚照御驾亲征算是有了结果，“功成名就”地返回北京。王阳明自言此间全靠良知指引。1520年农历九月，王阳明正式提出了“致良知”。

1521年3月，31岁的朱厚照驾崩，江彬等太监被处死。同年5月，王阳明在庐山白鹿洞书院广聚世儒、高谈阔论“致良知”学说。嘉靖皇帝即位，传旨要王阳明立即赴京朝见，拟表彰他南赣剿匪和南昌平叛之功。王阳明走到半路，又传来圣旨命令他不要进京，过程几近戏弄。朝廷认为：王阳明未获朝廷授命而擅作主张平叛，乃系蔑视朝廷，不但无功，反而有过。朝廷的这个态度，令天下人心寒，舆论哗然。嘉靖皇帝迫于民意压力，又故作姿态，对王阳明加官授爵，封为“新建伯”，兼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概为虚名虚职，无实惠实权。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很快，就有人上书朝廷要求剥夺王阳明的封爵，诬称王阳明是朱宸濠的同谋逆党。朝廷中还形成一股诋毁和攻击王阳明的势力，指责他宣扬“伪学”，陷害天下。1522年，朝廷正式颁令禁遏王学。1523年进士考试的《策问》考题竟然就是批驳和攻击王阳明的思想主张。见此情景，诸多弟子和友人意欲主持公道，为王阳明辩白，王阳明一概息言，默默忍受，无辩止谤。有一天夜深人静时，王阳明沮丧默坐，对门人说：“现在如果有一个洞穴，可以让我带着父亲逃跑，那么我愿从此远遁，永不后悔。”

### 金之在冶而超越平庸

面对忍辱负重、进退维谷、凶险异常的局面和处境，王阳明只能从自己的内心获得力量，用良知和本心指引自己的选择和担当。不得不说，这颇似释家“忍辱波罗蜜”的一种诠释。他后来感慨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人人都有趋乐避苦之本能，然而王阳明在与王纯甫的书信中却提出了一个非常精当的比喻，叫作“金之在冶”。他一生中经历的艰难挫折，在别人看来足够死上七八回，但是于他而言却都铺设了成圣成贤的“道路”。“譬之金之在冶，经烈焰，受锻锤，当此之时，为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视之，方喜金之益精炼，而惟恐火力锤锻之不至。既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锻炼之有成矣。”人在经过最深刻的磨砺和体悟后，便能“人心死，道心生”，从而超越平庸。

1527年，55岁的王阳明在绍兴系统讲授心学理论，他在天泉桥上与钱德洪、王畿授立四句教法：“无善无恶之心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史称天泉证道。看到应者云集，王阳明不禁感慨：不管世事如何变迁，无论是豪奢浮华还是噤若寒蝉，人们的内心深处仍存有不灭的良知，永远绵延着对天道的尊崇与向往。

1527年9月，王阳明从余姚出发去广西，途经江西。他沿途停留于广信、南浦、南昌、吉安，所到之处，弟子云集，民众欢迎，群情激昂。当年的吉安讲学，是王阳明一生最后一次大规模讲学。当年11月，王阳明到达广西，招抚了王受与卢苏，平定思恩、田州，兴学校，抚新民。1528年9月，王阳明以极低的代价扫除了断藤峡、八寨多年的匪患。当年11月，先生因病离开广西，启

程返家。1529年1月9日晨，王阳明病逝于青龙铺（江西大余县）码头舟上，年57岁，门人周积等人陪伴，留下“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临终遗言。至此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

### 圣人之心的力量

王阳明一生致良知，什么是良知？就是不用思考就明白的道理，不用学习就了解的那份“应该”，并不是知识学问越多良知就越多。他的信念是“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成圣贤”。

什么样的一生才算活得值得？王阳明疾病缠身、一生坎坷，在困顿与绝境中大彻大悟，在非议和险恶中毅然前行，历经千难万险，遍尝千辛万苦，屡仆屡起、百折不挠、忍耐克制、杀伐决断、化险为夷，57年的人生历程中安乐顺遂的“幸福时光”少之又少，然而他终究凭着自己的意志、智慧和心灵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光耀千古的传奇。他告诉我们：苦难，有时是一条道路。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杜维明评价王阳明，说他“继承和发扬光大了中国儒学特有的人文精神。他提出‘仁者要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就是要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他提出‘知行合一’，就是要创造人与社会的和谐；他提出致良知，就是要创造人与自身的和谐”。事实上，王阳明最终创造的和谐，是他在坎坷磨砺的一生中找到的依托和路径，阳明心学提倡建构的圣人之心，是那样廓然大公、磊落光明、峭岸坚定，这正是中华民族集体人格应有的核心。



人物志

增进道德修养，应当首先培养人的知耻心，因为“知耻近乎勇”，有羞耻心，才能促使人勇于改过自新，发现和恢复本有的性德。因此，耻是人培养德行的基础。

### 耻之于人大矣

《说文解字》中对“耻”解释为：耻，辱也。从心、耳声（“耻”字原写为“恥”）。“恥”是一个会意字，有闻过心生惭愧之意。羞愧乃心有所惭而生，故从心。又因耳为听闻的器官，人每因闻过而耳赤面热，故“恥”从耳声。每当人心生惭愧的时候，不觉会面红耳赤。《孟子》上说：“耻之于人大矣！”意思是说，“耻”这个字对人而言太重要了，为什么重要呢？人如果一有恶念，便生羞耻之心；一行恶事，就有愧恐的感觉，又耻又恐，一定会因此而停止自己的恶念恶行。因此古人曰：“耻可以全人之德。”知耻是保全人的思想、行为不离道德的护栏，因而也被古人称为“学人之喉关”，意思是说，一个人只要还有羞耻心，就有可以改过自新的机会。这就如病人一样，只要还没有封喉，那么只要有良药，还是可以把病治好的。但是如果一个人连羞耻心都没有了，那就如同封喉的病人，有再好的药对于他的病也都无济于事了。

在明朝袁坤仪教导儿子的四篇家训《了凡四训》中，把孟子的“耻之于人大矣”这句话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以其得之则圣贤，失之则禽兽耳。”因为得到了这个字的人、有羞耻心的人就能够成为圣贤人，而失去了这个字的人、没有了羞耻心的人就堕落为禽兽了。他接着说：“思古之圣贤，与我同为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师，我何以一身瓦裂，耽染尘情，私行不义，谓人不知，傲然无愧，将日沦于禽兽而不自知矣。”

这句话的含义深邃。意思是：让我们想一想古代的圣贤人，如孔老夫子、孟老夫子，他们与我们同样都是人，他们为什么成为万世师表，可是我们自己却为什么一身瓦裂呢？瓦裂，是指陶制的器皿，然而这个陶制的器皿破碎了，就一文不值了；耽染尘情，是指过分地贪着欲望的满足或感官的享受；此外，偷偷地做一些不仁不义的事情，还以为别人不知道，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将要堕落为禽兽，却不知不觉，还自以为为是、妄自尊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凡人与圣人之间如此之大的差别呢？差别就在于圣人知耻、有羞耻心，而有的人却把“耻”这个字给忘掉了。

### 知耻即向善好德的本能

人人都有知耻心。明朝提出“致良知”学说的王阳明就用生动的事实证明了此点。有一次王阳明外出，不幸与同行的人被盗贼绑架，当盗贼得知他是王阳明先生时，就问他：“您说人人都有良知，我们这群盗贼也有良知吗？”王先生肯定地回答：“有。”盗贼反问：“怎么能证明呢？”王先生要求他们说：“现在照我说的去做，我证明给你们看。”于是，王先生让他们脱掉外衣、内衣，一层层地脱掉，直到剩下最后一条裤子的时候，还命令他们脱掉。盗贼喊道：“不行呀，这个不能再脱了！”王先生说：“这知耻就是你们的良知啊！”

人的羞耻心和同情心表明了人性本身就具有一种向善好德的本能，也正因为如此，人做了错事、坏事会惴惴不安，因此，在儒家那里所提倡的道德，不是一种强加于人的外在的东西，而是



知耻近乎勇

在明了天道的基础上为了获取个人真正持久的幸福而进行的主动追求。正如孟子称赞古代圣王大舜的话：“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意思是说，舜既明了万物运行的法则，又洞察了社会人伦关系，于是自然沿着仁义之路走，而不是勉强地被迫去行仁义。

### 道德约束是追求幸福的起点

在古人看来，道德并非是对人性的一种束缚和说教，在明了天道和社会人伦关系的基础上培养相应的美德，这是符合人性的，是每个人自我发展的内在需要。孔子特别强调道德品质修养与心理健康的关系，而提出了“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的论断。意思是说，道德高尚的人俯仰无愧，胸怀宽广，坦坦荡荡；而小人则不能容人，心胸狭窄，忧心忡忡。因此，有德的人就是得“道”之人，这就表现在，从外在的方面看，得多助，可以得到人们的支持和帮助；从内在的方面看，可以获得心灵的安宁。正因为如此，道德不是外在的强制和说教，而是个体为了获得真正持久的幸福而进行的主动追求。

反之，人如果没有羞耻心，干什么都无所谓，久而久之，就会沦为衣冠禽兽了。因此《礼记》中讲：“鸷鹀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这就是说：虽然鸷鹀能够说话，但是仍然属于飞鸟；虽然猩猩能够讲话，但是仍然属于禽兽。现在如果人没有了礼，虽然能够讲话，不也与禽兽之心没有区别而成为会说话的禽兽了吗？正是为了使人们区别于禽兽，圣人才制礼作乐，以此来节度和引导人的行为，培养人的羞耻心。由此可知，儒家对人合理的自然欲望并不否认。但是，他们同时看到任何对自然欲望的过分追求，都会导向危险的境地。因此儒家特别讲究礼节。所谓“礼节”，就是用礼来节度自己不正确的、过分的欲望。

可见，“耻”这个字对人而言至关重要。培养正确的耻感，对于个人而言，获得的是一种道德智慧，由于这种道德智慧与每个人的实际生存状态、幸福生活密切相关，它不仅可以使人们勇于改过，免于堕落为禽兽，使人活得更有人的尊严，而且对于解决人生的烦恼、获得个人事业的成功和长远的幸福，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有所思